



“艺”的境界与追求

□ 刘余莉 邢梦霖

“艺”，最早见于商代的甲骨文、金文中，“艺”（𡗗）字为踞跪的人双手捧持禾苗或树苗栽种之形。《说文解字》释：“艺，种也”，引申为技能、才艺，指精通、辅佐、成就某事的能力。儒家有“六艺”之说：一为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一为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乐》《春秋》。“艺”是一个综合性概念，它融技艺养成、修德进道等为一体，其创生与发展不仅在整体上奠基了中华民族循道笃实的人文品格，决定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文化特质，更塑造了中华民族博施济众、革故鼎新的精神品质，成为中华文艺境和合的精神境界。

循艺笃信 辅成生意

天人关系为中国哲学的永恒话题。传统文化注重探究“天人之际”，古圣先贤为寻求天与人相接之处而追求不息，其中，创造并推广“艺”的范式最为质朴、切己。《诗经》有：“贍我来牟，帝命率育，无此疆界。陈常于时夏”，赞美后稷能够承接自然天道，创造耕种的树“艺”，且无疆界区分，将此艺广播于万民，造福万民，其德光大澄明、克配彼天。古人对树艺的熏习，昭示了从无到有、踏实笃信的创生之德，彰显了圣人借助天道而订立人极、敝造生存秩序的精神气象。《论语》记载，南宫适问孔子，“禹、稷躬稼而有天下”，孔子赞赏曰：“君子哉若人，尚德哉若人。”躬稼乃顺乎自然、订立生存秩序之大德，这种奠基文明范式、生存式样的境界，正是孔子所称赞的艺道。

源自耕种、耒耜、稼穡等自然园艺之“艺”，最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凝结为“博施济众”这个重要德行，成为中华伦理体系中处理天人关系的至高境界。《周易·系辞传》中有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的表述，古人在游艺的过程中，观照天地生生之德，参赞、辅成万物化育。程颢言，“圣人奉天理物之道，在乎六府”，即圣人顺应天道参与万物的生长，且设立

具体官职，制定相应的制度来安顿自然、各尽性命。宋代理学家喜观天地之“生意”，珍惜万物表现出来的勃勃生机，且辅助、成就此生生之德，助益生命的养成、生长及变化、更新。艺的精神境界，正包含着此种顺应自然之道而积极有为的天人观，蕴藏着儒家“泽及草木”“化及鸟兽”“顺物性命”等将天地万物纳入道德共同体的价值追求。

兴艺乐学 游艺进德

中华文明的精神境界是合于道的境界。中国古人认为，技艺近乎道，强调“下学而上达”，即通过技艺的学习兴发、彰明万物之道，来启引、模塑与应然之道相和合的道德境界。诚如《礼记·学记》所载：“不兴其艺，不能乐学”，即当个人技艺在长期艰苦学习锻炼中达至游刃有余的程度，则意味着他已经超越了技艺的层面而达至合于道的境界。王阳明肯定通过诵诗、读书、弹琴、习射等技艺的熏修，可以调习内心达至于贴合道的境界，且明确提出“艺者，义也，心之所宜”的观点。程俊英则将游艺进德视为实学之所出，指出“士固有滞于艺而不闻道者，要末有不通于艺而遽高语道德者”。南朝经学家黄侃亦言，“人生处世，须道艺自辅，不得徒然而已也”，将通达技艺视为自然而然进德至道的基石。

儒家有“六艺”之说，将兴艺乐学视作个体成才进德、缔造境界范式的具体遵循和逻辑进路。孔子言，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，明确指出游艺为进德志道之良方，且不以才技为趋尚，而应以寻究其中的人文蕴蓄为旨归，强调主体拳拳服膺、专一向往正道，通过日用游艺而体悟道，在日用伦常、熏习六艺中实现日新其德的境界追求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写道“夫儒者以六艺为法”，即儒者玩味经义、修习德行、指导行为。《礼记·经解》明确阐释六经之艺涵养人的德行、境界，如《诗》教人温柔敦厚，《书》教人疏通知远，《礼》教人恭俭庄敬，

《易》教人洁静精微，《乐》教人广博易良，《春秋》教人属辞比事。宋儒朱熹强调，当在熏习六艺中博其义理之趣。钱穆也讲，“游于艺，不仅可以成才，亦所以进德”。

技艺的养成，需数次习练，踏实谨慎，具备敬、慎、畏的态度，方能精确无误。对技艺的习练，缔造了中华文明庄俭恭敬、谨慎踏实、君子时的精神境界。周王朝教育体系中，周王官学要求掌握六种基本技艺，即五礼、六乐、五射、五御（驭）、六书、九数。《周礼·保氏》记载：“养国子以道，乃教之六艺：一曰五礼，二曰六乐，三曰五射，四曰五驭，五曰六书，六曰九数。”意即通过六种技艺的娴熟，形成个体的生存能力与道德境界。具体表现为，熏习五礼与六书，可明白尊卑际会之节，亲疏隆衰之分，明辨是非、厘定得失、恭俭庄敬。习练六乐、五射、五驭可兴发伦理道义、增进技艺、提升精神。熟习六书之法，可明古字体之所由，声音所分之法，文言所阐之大义。学习数艺则可掌握度数与中庸之道。以是，“艺道”二字，在古往今来的连用中，积淀为中华民族文化建构中的德行追求，也成为中华文明道德境界的重要表征。

超越创造 艺境和合

“艺”在中华文明精神境界中的特殊地位不仅囿于循艺、乐学、进德，更在于它构筑了华夏民族对宇宙、世界乃至天下的独特理解范式：超越创造，艺境和合。《荀子》认为“君子役物，小人役于物”，意即君子役物而不役于物，表现的是既在其中又不受制于它的超越精神。具体而言，即个体之于自然，借助自然之功，通过技艺的探索与练习，创造出高于自然又与自然相和合的新生事物，奠定了中华文明革故鼎新的超越精神境界。如大禹之于天地、自然、人类具有创生万物的超越精神，其治水的精神是与天地并列和合的精神。周公史无前例建构封邦建国的政治秩序和礼乐制度的文明秩序，彰显超越

创造精神。汉武帝“嘉唐虞而乐殷周，据旧以鉴新”，既在唐虞三代之中，又立足现实据旧鉴新，与古之文明相和合又有区别，体现超越创造的和合精神境界。

修习技艺，应遵守物本然之理法，“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”，来引导、创造，方可既超越物本身又与物相合，呈现在人文精神境界中即坚守道义可超越自我甚至生死。如郑国贤大夫子产欲进行经济改革，面对国人质疑，曰：“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。”孔子于春秋礼崩乐坏之际，传承斯文，赓续文脉，尽己所能，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，一生以“郁郁乎文哉”的周德为追求，体察“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”之道，并且坚守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的原则。

正是在这种讲究经验与技艺，可超越自我甚至生死的宽广广阔的精神境界范式下，中华文明形成了天下秩序建构的价值追求与精神境界，即天下为公、艺境和合。《周易》明确阐释了修习技艺，关乎天文而化成天下的逻辑理路，“刚柔交错，天文也；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”，即以自然之文订立人文，超越创造万有，与天地为一。

“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，契合孔子心中的敦和艺境，指向生存状态、文明状态的整体完善，体现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范式与艺境和合的境界追求。“艺”的理念与精神，也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笃信、求实、成就的宏阔胸襟，连续、创新的无畏品格，统一、包容的开放胸怀以及和平、和谐的精神气质。



聚焦加强党的领导，加快汇聚干事创业新合力

我们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，统筹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锐意进取、跳起摸高、担当作为，奋力把西部大开发的美好愿景转化为甘肃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图景。深入推进凝心铸魂工程，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深入推进选贤任能工程，树立重担当、重实干、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，注重在产业发展、招商引资、生态保护、乡村振兴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，认真落实“三个区分开来”要求，健全容错纠错免责工作机制，加大对基层干部关心关爱力度，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、为负责者负责。深入推进人才赋能工程，坚持党管人才原则，坚持自主培养与柔性引才相结合，完善人才管理、评价、激励、使用、流动等制度机制，着力抓好科技创新、金融管理等人才队伍建设，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。深入推进强基固本工程，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，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建组织建设，开展基层党组织质量提升行动，常态化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，加强村干部和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，不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。深入推进先锋引领工程，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，纵深推进“抓学习促提升、抓执行促落实、抓效能促发展”行动，坚决纠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集中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，让基层党员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服务群众、投身发展、狠抓落实上，努力谱写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崭新篇章。

干宝，字令升，东晋史学家、文学家。干宝自幼博览群书，出仕后曾担任佐著作郎。东晋政权刚刚建立，干宝就由王导举荐出任史官，并受命撰修《晋纪》。《晋纪》取法《春秋》，采用编年体，记载了西晋宣帝至愍帝间一百余年之事。《晋纪》一书文字简约、记事审慎、议论得当，得到了历代史家的交口称赞，有“良史”的美誉。《晋纪总论》是附于《晋纪》全书之末的一篇历史评论，干宝以慷慨之情总论西晋一朝的历史，剖析司马氏为政的得失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。

《晋纪总论》回顾了司马懿、司马师、司马昭与司马炎祖孙三代四人创业立国的历程，突显了司马氏起于乱世而致太平的宏伟事业。继而采用对比的方式，叙述惠帝一朝的混乱现状，揭露选举失当、是非不明的混乱现状，哀悼天子失位、王室操戈的悲剧。西晋一朝可谓“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”，这引发了干宝的思索，促使他将目光转入到对治世之道的探讨上。干宝将礼义道德视为“治道”的基石，认为礼义道德关乎国家安危，并辅以周朝崛起兴盛的史实加以印证，最后总结西晋为政的过失，探讨亡国的深层原因，在篇末以“曲终奏雅”的方式寄寓自己对现实的期待与展望。纵观《晋纪总论》一文，骈散兼行而又文法井然，议论精警、切中时弊，确为魏晋文章的典范。

在辞章之外，这篇史论常为人称道之处在于《晋纪总论》延续了“春秋笔法”。历代史家常常以“直”来评价干宝，正是缘于他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。“春秋笔法”精神在于实录，陈寿、陆机、王隐、虞预等人编纂晋史，对高贵乡公曹髦被弑一事都避而不言，只有干宝《晋纪》据实记载，这得到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高度赞扬。在《晋纪总论》中，干宝一以贯之地秉持了实录的精神，毫不避讳地直陈西晋朝政的过失。在论述西晋短祚而亡的深层原因时，干宝尖锐指出世风败坏的根源就是司马氏“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”。统治者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导向，以至于道德沉沦、礼法崩坏，士人不再像汉代那样笃守名教礼法，出现名不副实、重利轻义的不良风气，整个社会陷入“耻尚失所”的价值缺失之中。作为东晋的史官，干宝并没有对司马氏统治的西晋现实加以回护，而是秉笔直书，真实地记录了现实，加以严厉批判，坚持了史家的立场。

当然，如果仅仅凭借实录的精神，《晋纪总论》还不足以成为历代史家所推崇。《晋纪总论》的价值更在于干宝对人事盛衰的关切，对治世之道的思考。自《春秋》以来，直至司马迁《史记》，史家都在关注“天人之际”，思考天道与人事的关系。干宝也不例外，我们看到他在讨论人事盛衰时也受到了“天人感应”学说的影响，例如他言及西晋创业时以“天符人事”解释司马氏灭蜀，又将周代兴盛视为“天命昭显”。但干宝在天人关系上并非完全遵循汉儒旧说，而是呈现出自己独特的思考。他十分重视人的主动性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《晋纪总论》中“以德配天”的观念窥探一二。干宝虽然承认了帝王之兴是天命所定，但他更加强调君主不可妄为，应当保养道德内涵，顺应大道。西晋亡国并非天命，而是君主不修仁德，故而干宝总结道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”。由此我们可以判定干宝所言天人关系，其着眼点仍旧是人事兴衰。

人事兴衰系乎治世之道，干宝要从西晋治乱之中寻绎“治道”。司马氏三代积累，最终亡魏而成晋。在干宝看来，司马懿知人善任，有容人之量，司马师、司马昭承继父业，外平边患内抚纷乱，司马炎魏称帝，完成了统一大业。至此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西晋太康之世也可称为一时盛世。然而到了惠帝时期，王朝急遽衰落。干宝在剖析兴衰转折的原因时，将目光聚焦于选举用人。西晋选举实行九品官人法，以德行、才能与家世为标准，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渐渐产生了重家世而轻德行才学的倾向，这在社会中造成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。选举重家世，贵族子弟不拘资历才能越级擢升，以致朝野上下竞相追求官；选举轻德行，导致为官之人只关注利益，而缺少道德情怀；选举不论才能，致使当选者缺乏识人辨才的能力，以致奸邪之徒趁势而起。干宝的观察敏锐而深刻，西晋朝政之误导源于用人之失，这一判断得到了千载之后王夫之的认同。王夫之认为，王朝用人最为关键，西晋虽然不存在曹魏苛政严法的弊端，然而朝廷取士不当以致佞人当道，任用佞人以致朋党相争，最终速亡。干宝讨论用人之失，涉及到了道德标准缺失的弊病，这自然将观察视角导向了朝廷对道德礼义的态度上。

朝廷拔擢人才不论道德，选才大多为邪佞之徒，士人也缺少谦让耻之

干宝《晋纪总论》中的『治道』

□ 王 勇

心，导致腐败盛行，干宝不由悲叹道“礼法刑政，于此大坏”。朝廷选举不仅是选拔国家官僚，更是宣扬国家价值体系的途径，还是施行“王化”的重要手段。借由选举，中央王朝将统治意识形态宣之于民众，引导民众以道德礼义规范自身，从而达到教化的目的。汉代盐铁会议中，文学之士十分看重朝廷的价值导向：“导民以德，则民归厚；示民以利，则民俗薄。”如果朝廷以道德引导人民，则民风厚朴；如若朝廷显示出重利的态度，则民风浇薄。西晋选举的不良倾向造成士人乐得投机而不屑坚守正道，崇尚空谈而讥笑勤黜。由此，传统价值体系开始崩溃，儒家所标举的仁义礼智信等品德都被抛弃，引发的种种乱象动摇了国家的根本，晋室统治难以长久就是历史的必然了。所以干宝认为晋末动乱表面看来是贾后干政、韩午擅权所致，实则是道德价值崩溃的结果。

西晋衰亡缘于用人之失，用人之失缘于选举不当，选举不当缘于王朝不尊礼义道德。鉴于于此，干宝将“治道”之本系于道德价值，提出了一个深邃的命题：“盖民情风教，国家安危之本也。”百姓笃守礼义，不为邪僻之事，能够为国死难而不求生害义，更谈不上作乱。干宝进而以前代历史为参照，从中得到了一个结论：“爱及上代，虽文质异时，功业不同，及其安民立政者，其揆一也。”虽然上古以来典章制度不同，但治世有恒一不变的法则，这就是“赖道德典刑”。以道德礼义治国，这是儒家一贯的说法，孔子言“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”，孟子也主张行仁政。干宝的观点虽看似传统，却有其独到的认识。干宝认为百姓爱憎相异、利害不同，所以互相争夺，这是恒常的规律。治世要以“大道”，不能与百姓相争，不居功自傲，不侵占百姓之利，让百姓体察到君主的好生之德，从而心悅诚服。如此，国家根本牢固，才可以长治久安。干宝以周代为例，历数周室先王忠厚之德，褒奖其仁政之举，以此论证治世以德的合理性。

《春秋》之旨在于“惩恶而劝善”，史家之责不仅在于忠实记录历史，更应对历史作出评判。干宝《晋纪总论》所论的“治道”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政治思想，又融入了自己的见解，有助于矫正世风，树立正确的价值体系。萧统《文选》收录此文，其标准乃是“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乎翰藻”，于《晋纪总论》而言，此评甚为精当，其中之“治道”正是干宝沉思的结晶。

